

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ZHONGGUO JINDAI LUGI SIXIANGSHI LUN PENGYILIAN ZHU

彭济志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论

彭漪涟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 王鉴平
封面装帧 吕洁
王健纲

中国近代复辟军变史论

彭漪注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本书在上海发行所经销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8.28 字数 190,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300

ISBN 7-208-00987-2/B·134

定价 5.50元

序

冯 契

中国近代进行了一次哲学革命(它现在还在继续着),其中包括逻辑思想和方法论的革命。逻辑和方法论问题的讨论,是中国近代哲学的主要论争之一。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作了很多探索,有积极成就,也有不足之处。

中国人一旦接触到西方的文化,就不能不意识到逻辑思维方式上的民族差异。严复是第一个认真比较了中西文化特点的人。在他看来,中国传统学术有个重要弱点,就是概念不明确,逻辑不严密。中国人习惯于从“诗云”、“子曰”出发的经学方法,极易导致独断论的“师心自用”。这都是由于中国人长期不重视形式逻辑和科学方法的研究所造成的。严复指出,逻辑学对近代科学来说,“如培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西方数百年来“学运昌明”,首先应归功于培根的破除“偶像”和提倡科学方法。中国要自强,就要向西方学习科学,就必须重视逻辑和科学方法的研究。正是有见于此,严复翻译了《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等著作,系统地把西方的形式逻辑和实验科学方法介绍到中国。严复的影响是深远的,自他以后,许多进步的思想家如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等,都很重视逻辑学的研究,强调要用近代的科学方法来取代传统的经学方法。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孔家店”的经学独断论受到猛烈冲击,随着民主和科学的

口号深入人心，逻辑学和方法论的研究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产生了广泛影响。到三十年代，西方的数理逻辑被系统地介绍过来了，马克思主义者在运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于现实与历史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但是，尽管有很多成绩，中国近代关于逻辑和方法论的探讨始终未能得到系统的总结。理论的演变只有通过自由讨论和系统的总结，才能提高自觉性。如果得不到科学的总结，那便会陷于盲目性。30年代展开了一场所谓“唯物辩证方法论战”，随后又引起如何改造形式逻辑问题的争论。这本来是一个通过自由讨论来进行总结的好机会，然而实际并非如此。这场论战正好暴露了当时哲学界在逻辑问题上的盲目性和缺点：首先，方法论革命的最本质的要求是用近代科学方法来取代古代经学方法，对此，许多参加论战者并无明确的意识。叶青、张东荪之流一味强词夺理，是不必说了。马克思主义者也习惯于引经据典来作论证，运用了变相的经学方法。其次，从总体上说，参加论战者的逻辑理论水平不高。关于逻辑和方法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的关系，认识论、逻辑和方法论之间的关系，思想解放和科学方法的关系等），都还缺乏真正深入的研究。就30年代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既未能阐明形式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也未能划清形式逻辑与形而上学的界限，并且对形式逻辑有否定过多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存在于当时苏联哲学界，并可追溯到黑格尔）。

建国后，在50年代又展开关于逻辑问题的热烈讨论，这比之30年代是深入得多了。但是上述两个缺点也还未能完全克服。例如，相当长一段时期，摆不正形式逻辑和辩证法的关系；不敢对经典作家关于初等数学和高等数学的比喻提出不同意见；有

一些人贬低形式逻辑和忽视数理逻辑的作用，另一些人则否认辩证逻辑的存在；等等。这种缺点之所以难以克服，是同中国近代逻辑思想的演变缺乏科学的总结有关的。

彭漪涟同志多年从事普通逻辑和辩证逻辑的研究，已发表不少论著，取得显著成绩。他在研究建国后逻辑科学发展的现状及其所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时，深感不能割断历史，许多问题需要作历史的考察才能得到解决。于是便着手研究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发展史，化了数年工夫，写成了这本书。我读了他的书稿，感到他在一个前人很少涉足的领域中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是难能可贵的。而且我认为，他这本书亦已颇具自己的特色：

第一，作者运用了逻辑和历史统一的方法。逻辑思想本身有其发展的“逻辑”，这种“逻辑”是在具体的历史过程中逐步展开的。因此，决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来孤立地考察逻辑思想的演变。作者正因为考虑到每一时代逻辑思想的发展，总有其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包括一定的科学和哲学前提，所以，他在考察中国近代逻辑思想的发展时，并不拘泥于谁是逻辑学家，谁不是逻辑学家，而是注意从那些对中国近代哲学和科学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学者那里，去发掘他们必然固有的逻辑思想，并将其与他们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所面临的逻辑-方法论问题结合起来考察，历史地、具体地阐明其在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以便连贯起来揭示其发展的“逻辑”。

第二，作者综观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发展史，从总体上概括其特点。认为主要特点有三：（1）适应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需要，突出进行了归纳法与归纳逻辑的宣传与介绍（但当时对已在西方迅速发展的数理逻辑，迟迟未加重视和研究）。（2）西方逻辑思想的翻译和介绍，推动了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掘，特别是促进了对墨家逻辑的研究。（3）外国逻辑的译介和对《墨辩》

的再研究，促进了对世界上三种逻辑体系的对比研究。本书紧紧围绕这几个方面对各家的逻辑思想和成就进行了分析，揭示其在历史发展中的层次性和连续性，显得脉络分明。

第三，书中还比较鲜明地揭示出各家逻辑-方法论思想的个性特点。例如，突出地论述了严复在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上的开山祖地位；详细地阐发了章太炎如何用他的“辨说之道”的模式来对三种逻辑作对比研究；对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结合他本人的论著和同时代学者的有关评述，作了充分的分析；对胡适的“大胆的假说，小心的求证”的方法，针对各种分歧的意见，作了有说服力的辩护；……这些抓住个性特点的论述和评析，会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

总之，本书对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史的研究已作了颇具特色的开拓性工作。当然，开拓性工作总难免有不足之处，某些问题可能没有抓住，某些论断可能不够恰当、全面。本书对六个思想家和学者的逻辑思想进行了论述和评析，实际上只考察到20年代为止。对此，读者可能会感到不满足，要求继续前进：30年代有“论战”，金岳霖系统地介绍了罗素的数理逻辑并对逻辑哲学问题作了真正深刻的探讨，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新民主主义论》则可说是运用辩证逻辑的典范，……这些都是近代逻辑思想发展史上的大事，需要作深入考察的。作者可能认为对这些重要问题的考察需要更多的时间，只好俟诸异日，但既已开始了开拓性工作，想来他一定会继续做下去的。我还期待着更多的同志参加这一工作，有更多的研究中国近代逻辑思想的论著出现，以便通过生动活泼的自由讨论来对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和方法论的发展、演变作出比较全面的总结，这对于发展我国的逻辑科学和提高民族的逻辑思维水平，对于进一步发展哲学革命，都是有重要意义的。

目 录

序.....	1
导 论: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发展的历史反思	1
一、严 复.....	24
(一) 关于归纳与演绎的基本思想	24
(二) 正名论的逻辑思想	36
(三) 在中国近代逻辑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53
二、梁启超.....	69
(一) 逻辑—方法论思想	69
(二) 对墨家逻辑学的研究及其成就	88
(三) 对墨家逻辑、印度因明和西方逻辑的对比研究··	101
三、王国维.....	109
(一) 基于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点分析的概念理论 ..	109
(二) 对充足理由律的探讨	121
(三) “二重证据法”及其逻辑—方法论意义	124
四、章太炎.....	140
(一) 对中国古代逻辑科学发展轮廓的勾画	140
(二) 概念形成、发展的理论.....	148

(三) “辩说之道”的基本思想	159
(四) 对西方逻辑、印度因明和墨家逻辑的对比研究··	172
五、胡适	183
(一) 中国逻辑史上的第一部断代之作——《先秦名 学史》的学术成就及理论意义.....	183
(二) 对墨家逻辑学的系统研究及其贡献	195
(三) 一个重要的逻辑—方法论命题：“大胆的假设， 小心的求证”.....	212
六、章士钊	231
(一) “以欧洲逻辑为经，本邦名理为纬”——中西 逻辑比较研究的理论与实践	231
(二) “Logic”一词汉语译名的厘定	243
(三) 对先秦名墨逻辑思想的研究	245
后 记	256

导论：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发展的历史反思

中国近代,特别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期,逻辑科学在中国获得了相对迅速的发展。西方逻辑,主要是传统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被系统介绍和引进;中国古典逻辑,主要是墨家逻辑(或称墨辩逻辑),在经过秦汉以来的长期沉寂之后,重新得到系统研究;印度因明,随着晚清佛学的盛行,也引起了一些学者的重视和注意。于是,人们很自然地要提出和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长期遭到冷遇的形式逻辑,到近代却身价倍增而受到思想家们如此普遍的青睐呢?逻辑科学,主要是传统形式逻辑在中国近代的发展具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呢?形式逻辑在中国近代的发展给我们提出了一些什么样值得重视的理论思维的经验教训呢?研究和把握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发展的历史,首先必须弄清这些问题。

形式逻辑在我国古代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发展,我国古代缺乏形式逻辑的传统,这是当前中外学者基本一致的看法。一方面,我国的古典逻辑(主要是墨家逻辑)命运多舛,“汉晋以降,其学几绝,而书仅存。然治之者殊尠……”(孙诒让《墨子闲诂·序》);另一方面,外来的逻辑,由于同我国古代传统的思维方式相抵牾,也得不到重视。印度因明,虽经唐代高僧传入中国,“震

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消沉歇绝。”(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第251页)希腊亚里士多德逻辑在中国最初的命运，似乎比因明更惨。由明末李之藻翻译的《名理探》(原名《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概论》)是我国译介的第一部亚里士多德逻辑著作，然而，从1963年开始刊刻问世后，却长期无人问津，以致三百年后，国内公私藏书中遍寻其刊本而不可得。这就是说，中国土生土长的逻辑长期湮没无闻，而外来的逻辑，又累遭厄运。这样，形式逻辑在中国得不到充分发展，也就是必然的了。

然而，到了近代，随着封闭的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的枪炮打开了门户，在为了自强保种而向西方学科学、学技术的热潮中，人们对逻辑科学的重视和热情，却急剧地增长起来。逻辑学的著译大量问世。仅按汪奠基先生在《中国逻辑思想史》参考书目中所列，从1903年到1920年间，就出版了包括严复译的《穆勒名学》、《名学浅说》、王国维译的《辨学》及张子和著的《新论理学》等在内的著译约二十余部。同时，也出版了一批研究中国古典逻辑，特别是墨家逻辑的专文或专著。主要有：梁启超的《墨子之论理学》，章太炎的《原名》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的第六篇(墨子)和第八篇(别墨)，章士钊关于《墨经》的一系列文章(见《逻辑指要》的附录。其中着重探讨了《墨经》中的逻辑学问题)；20年代左右，胡适又著《墨子小取篇新诂》，梁启超则有《墨子学案》、《墨经校释》等等。《墨辩》逻辑学的研究一时蔚为大观。

为什么在中国近代，逻辑学，主要是传统形式逻辑能如此一反常态地得到相对迅速的发展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第一，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的入侵，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也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不同的人从各自不同的动机出发，争

相向西方学习。封建地主阶级中的洋务派，在“器变道不变”的旗帜下，提出要学习外国“利器”、汽机兵械，以达到“船坚炮利”的目的；资产阶级的维新派，则着重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天赋人权论，为其变法维新，寻找理论根据。戊戌变法失败后，更多的知识分子和有识之士，则转向提倡学习西方近代文明和科学技术。在他们看来，西方列强之所以能“船坚炮利”，欺凌我国，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其科学技术的发达和进步：“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严复语）为此，他们认为，要学习西方就要学习西方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医治我国之“民愚”，而增强“民智”。但为了有效地学习西方近代科学，又必须首先学习西方科学的治学方法。严复指出：“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相埒耳。至于晚近言学，则先物理而后文词，重达用而薄藻饰。且其教子弟也，尤必使自竭其耳目，自致其心思，贵自得而贱因人，喜善疑而慎信古。”（《原强》）强调“学问之事，往往因所由涂术（即方法——引者）不同，其得果因而大异”。（严复《政治讲义》）由此出发，严复等人也就认为，逻辑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穆勒名学》“引论”的案语）。不懂得逻辑学，“则吾心不足以察不遁之理，必然之数也”，（严复《原强》）当然也就不可能学好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近代科学。对此，梁启超也说得非常明白。在他看来，“论理学（即逻辑学）为一切学问之母。以后无论做何种学问，总不要抛弃了论理的精神。那么，真的知识，自然日日加增了。”（《墨子学案》）在这样的认识、这样的时代思潮的推动下，当时的一些学者，就在一个时期里（主要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致力于介绍西方的逻辑论著和逻辑思想，努力发掘我国古代逻辑科学的遗产，从而使逻辑学形成了某种相对发展的局面。

第二，近代时期逻辑科学在我国的迅速发展，也是我国近代

有识之士对我国传统思维方式进行反省，尤其是对我国旧学空谈性理、“师心自用”的治学方式进行批判的结果。

诚如严复前面所说：“夫西洋之于学，自明以前，与中土相埒耳。”为什么自明代开始，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就日趋缓慢，以至近代以来远远落后于西方呢？人们不能不思考这一问题。他们在探索这一现象的原因的过程中，逐步开始了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特点的反省。1905年，王国维在其所著《论新学语之输入》一文中，通过对古代中国、印度、希腊的对比分析，曾明确指出：“我国人之特质，实际的也，通俗的也。西洋人之特质，思辨的也，科学的也，长于抽象而精于分类……夫战国议论之盛，不下于印度六哲学派及希腊诡辩学派之时代，然在印度，则足目出而从数论、声论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因明学。陈那继之，其学遂定。希腊则有雅里大德勒（现译“亚里士多德”），自哀利亚派、诡辩学派之辩论中抽象之而作名学。而在中国则惠施、公孙龙等所谓名家者流，徒骋诡辩耳！其于辩论思想之法，则固彼等所不论，而亦其所不欲论者也，故我中国有辩论而无名学（现译“逻辑学”，主要指传统形式逻辑），有文学而无文法，足以见抽象与分类二者，皆我国人之所不长。”而抽象与分类乃形式逻辑方法或实证科学方法的基本环节和基本内容，因此，王国维在这里，实际上已经初步意识到中国缺乏形式逻辑的传统和与之相适应的实证科学方法的这一历史事实，并意识到这正是影响和阻碍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王国维看来，正是由于这种抽象力的缺乏，就使得在名与实、概念、语词与实物之间，引起了“用其名，而不知其实，其实亦遂漠然无所依，而不能为吾人研究之对象”的严重后果。因此，通过这种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进行反省而得出的结论只能是：必须加强对形式逻辑的研究和引进。

上述中国传统思维的特点，也是同中国两千多年来的旧学的影响和积习分不开的。因此，面对近代列强的入侵和西学的传入，一些有识之士在新的形势下有了新的觉醒，因而，对中国旧学，特别是其空谈性理、“师心自用”、钻故纸堆的那一套，又在前人基础上，进行了新的反省和批判。比如，严复就曾批评中国旧学的一大弊病，在于仅从传统的“古训”出发，由“古训”以演绎一切。“每欲求申一说，必先引用古书，诗云子曰，而后以当前之事体语言、与之校勘离合，而此事体语言之是非遂定。”（《名学浅说》第57页）至于“古训”之是非如何，从不问及，于是，多少年来，人们对“古训”不敢越雷池一步，而是陈陈相因。“所考求而争论者，皆在文字楮素之间，而不知求诸事实，一切皆资于耳食。”“但服膺于古人之成训，或同时流俗所传言，而未尝亲为观察调查，使自得也。”（《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其结果，就不过是“将古人所已得之理，如一桶水倾向这桶，倾来倾去，总是这水，何处有新知识来？”（《名学浅说》第58页）显然，对中国旧学的这种反省和批判，已经不完全相同于人们过去对旧学所作的批判，而是站在近代实证科学方法的基础上，从获得新知识的角度，对中国旧学那种纯靠“古训”以演绎一切的模式及危害所进行的批判了。因此，通过这样的批判所必然得出的结论也只能是：必须提倡用实证科学的方法，用科学归纳法来研究自然界的对象和现象，以促进中国近代科学的发展。因而，这样的反省和批判也就必然成为推动中国近代形式逻辑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随着帝国主义入侵而引起的“门户开放”，产生了一批既懂外文、熟悉外国科学发展情况，又于中国旧学有较深造诣的知识分子，使宣传、介绍外国的逻辑科学知识和近代科学方法成为可能，也使进一步研究中国古典逻辑成为可能。这是逻辑科学在中国近代得以较迅速发展的一重要条件。

关于这一点,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经指出:“‘鸦片战争’以后,渐休于外患;洪杨之役(指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引者)借外力以平难,益震于西人之‘船坚炮利’。于是上海有制造局之设,附以广方言馆,京师亦设同文馆,又有派学生留美之举,而目的专在养成通译人才。……戊戌政变,继以庚子拳祸(指义和团运动——引者),清室衰微益暴露。青年学子,相继求学海外。而日本以接壤故,赴者尤众。壬寅癸卯间(1902—1903年间——引者),译述之业特盛,定期出版之杂志不下数十种。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这种出国留学热潮的出现和译述之业的盛行,也就为译介西方逻辑著作准备了必须的翻译人材这一重要的主观条件。而且,在这批人中,不少人又于中国旧学有较深造诣,如严复、梁启超、王国维、章太炎、胡适、章士钊等。因此,他们均能参照外国逻辑科学的成就,发掘和解释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和逻辑遗产,使之成为宣传和介绍西方逻辑的依托和结合部,从而,推动了逻辑科学在近代中国的发展。

总起来说,逻辑科学,主要是传统的形式逻辑在中国近代之所以能得到较迅速的发展,是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客观的与主观的)已经准备。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历史条件的特殊性,使得由其产生和发展而来的中国近代逻辑思想也就不可避免地具有某些相应的显著特点。

二

综观中国近代逻辑思想的发展,有哪些显著特点呢?概括地说,主要的有:1. 适应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需要,归纳法和归纳逻辑的宣传、介绍,被置于首位;2. 西方逻辑思想的译介,推动了对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发掘,促进了对墨家逻辑的重新研究;3. 外

国逻辑的输入和对《墨辩》逻辑的再研究，促成了对世界上三种逻辑体系的对比分析。下面，我们依次予以讨论。

第一，归纳法、归纳逻辑的宣传和介绍，被置于首位。

这是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发展历史的一个最突出的事实。首先，这个时期最早翻译的几部西方逻辑著作，也是在中国近代时期影响最大的几部逻辑译著，大都是强调归纳法和归纳逻辑的著作。如严复所译约翰·穆勒的《穆勒名学》，耶方斯(W·S·Jevons)的《名学浅说》和王国维所译耶方斯的《辨学》等。其中前一部著作主要是讲归纳法的著作，是西方近代归纳逻辑的主要代表作，这是没有问题的；至于耶方斯本人，当然不能说是一个归纳逻辑学家，但是，他在严复和王国维所分别译出的上述后两部著作中，对归纳逻辑有所推崇，认为只有归纳法才是求知的最科学的方法，这却是事实。

其次，在中国近代译介和研究逻辑学最有成就的主要学者，他们也是着重强调归纳法和归纳逻辑的。比如，严复不仅在所译的《穆勒名学》的案语中，强调“夫外籀不与内籀对也，而实为内籀之一术。”（《穆勒名学》第229—230页）并在其译述的《名学浅说》中，强调“外籀术重矣，而内籀之术乃更重。”（同上书，第57页）明确认定归纳法比演绎法更加重要。而且，他在为自己的其他译著所写的案语中，在他的一些讲演和论文中，也反复着重强调运用内籀之术即归纳法的重要性。如1905年，他应上海青年会邀请而作的系统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的讲演（后以《政治讲义》书名出版）中，就不仅多次强调运用归纳法的重要意义，甚至直截了当地说：“此后吾党之言政治，大抵不出内籀之术”（《政治讲义》第14页），对归纳法和归纳逻辑倍加推崇。而梁启超则更是明确地把归纳法视为近代实证科学的基本方法，强调真正的科学就在于运用归纳法“根据经验的事实，分析综合求出一个近真

的公例以推论同类事物”(《人生观与科学》)。因此,在他看来,归纳法的产生,是近三百年内“论理学的面目……完全革新”和“科学勃兴”的“原动力”。由此出发,他还对归纳法的程序和基本环节以及在历史学中归纳法的应用,进行了多方面的具体探讨。胡适也同样强调归纳法。他在《国语语法概论》一文中指出:“研究文法的方法,依我看来,有三种必不可少的方法:(一)归纳的研究法;(二)比较的研究法,(三)历史的研究法。这三种之中,归纳法是根本法,其余两种是辅助归纳法的。”(《胡适文存》卷三,第658页)因此,他在自己后来所写的自传中,曾明确说明他在1911年和1916年所写的文章里(如《尔汝篇》、《吾我篇》等)“我的首要兴趣便是归纳法,也就是把相同的和不同的例子归纳起来加以比较研究,以求其概括性的结论。”(《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上,第134页)后来,他又在总结清代学者治学方法的基础上,提出了“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方法,并认为这是他“二三十年来关于方法的文章里面……讲治学方法的一种很简单扼要的话。”(同上书,第440页)而这一方法实际上就是作为近代实验科学方法的假说演绎法,因而它表明胡适已经注意到同演绎法的结合来论述和看待归纳法的作用了。这无疑是他较之他的前人和同时代人的高明之处。

总之,无论是从当时出版的有影响的译著来看,还是从当时最有成就的学者在逻辑学方面的有关论述来看,虽然我们不能说中国近代逻辑思想的发展存在着否定演绎法的倾向,但相对地说,轻视演绎法,而重视归纳法、重视归纳逻辑,把它们作为当时优先强调的内容,作为宣传和译述的重点,这确是事实。因而它也就自然成为中国近代逻辑思想发展历史的一个突出特点。而之所以如此,当然也并非偶然。首先,这是由帝国主义的入侵和西方近代科学技术的输入而刺激和激发起来的、为发展近代